

天高云淡的日子，浦东机场国际出发安检入口，我跟儿子说，来，抱一下。1.82米高的大男生略有难为情地伸出长臂俯身在我后背轻轻拍了拍，算是配合完成了这个母亲大人自定的说再见仪式，然后，随着通道里络绎不绝的人流，大踏步地向前，很快就不见人影了。

回程路上，打开手机，微信朋友圈美图刷屏，晒的都是申城“水晶天”，外滩、人民广场、陆家嘴……天气是真好啊，而我，盯着一条短信发了呆，那是一条出行服务APP的提醒：布莱顿，雨。

## 布莱顿，雨

余果

布莱顿是英国南部的一个海滨城市，也是儿子此行的目的地。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，儿子将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，从那里转乘去布莱顿的大巴。布莱顿属于“大伦敦”区域，从伦敦市区乘火车南下，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。但是因为机场距离市区颇远，在火车站购票转乘也还要耗费时间，又带着大件行李，所以，儿子选择机场直接发车的大巴，虽然它时速不如火车。

机场出关约需2小时，我在心里默算，这个航班停靠的是五号航站楼，大巴站在四号，航站楼摆渡再加上现场购票等车，当地时间晚上8点前儿子能上大巴就不错了。大巴沿途要靠站，抵达终点布莱顿大概也要2个小时。从车站到宿舍，儿子拖着行李箱背着一个死沉的背包，一个人，没带伞（他不学飞的英伦派头是要么用长柄伞要么不撑伞），一件薄衫，在海上吹来的冷风里，要多走多远？走多久？布莱顿今日气温8℃~16℃，这样的天气，深夜，人口密度不大的小城路上还有人吗？或者说，还有哪样的人？

心里顿时浮现出去年夏天去那里见过的景象，海滨大道上，胡子拉碴裹着破烂衫的流浪汉沐浴着英吉利海峡上空

落日的霞光喝着不知道是捡来还是讨来的啤酒，一脸痴笑。胆小如我，对此景象是不敢多看的。布莱顿位于英伦三岛的南端，相比之下是英国维度较低气候最温暖的地区之一。这里历史上就是度假胜地，和其他知名度度假城市一样，也很盛行流浪汉。布莱顿还是座庆典之城，每年节庆活动不断。

想到这，又想起儿子跟我提过，他和同学见过有人街头犯罪；上学期，他们租住的街区，曾发生流血斗殴事件；合租的室友有一天发现门上有印记，疑似不法之徒踩点留下的暗号，于是他们那几晚睡觉都在门窗边特别放了凳子，凳上放盆碗，用作预警，儿子还把健身玩的精钢三节棍放在枕头下，还好像是虚惊一场……

儿子远行的这一晚，我总是无法安睡。凌晨3点，伦敦时间晚8点，我翻身看了手机，看到儿子新发的微信消息：上了大巴了。凌晨5点多，又一条消息：到了。

高冷派的儿子，文字总是极简，在家时嫌我啰嗦，有时候发信息还会假装没看到不回。但是，每次长途旅行让他报平安，和送机时的拥抱一样，虽然大概内心也是嫌弃的，却总还是按老母亲的心意一一照做。下雨吗？冷吗？饿不饿？是不是很累？隔着7个小时的时差，我克制住没有多问。

十九岁、二十岁，母亲眼里仍然是半大的孩子们，远异国他乡，从生活到学习，都必须完全独立应对了。天涯地远，山长水阔，担心确实是没有用的。不经历风雨怎能成长？孩子们其实一切都明白，担心不如相信。布莱顿下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雨总会停的，何况，对了，那里还是英国阳光最多的城市呢。

不久前读到晚报刊登的周元先生的马勒别墅设计师之谜，勾起了许多与马勒别墅有关的回忆，冒昧地作为对周先生文章的一点补白。

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马勒别墅饭店，如同童话国度里的褐色彩砖为墙的梦幻城堡，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这里曾经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（后改称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）所在地。当时我是团市委宣传科的工作人员，在二楼紧东边的一个办公室里上班。这个办公室不算小，摆放着一些写字桌，我们办公、开会都在这里。

## 结缘马勒别墅

朱宇

我记得，1954年我的结婚仪式就在这个办公室里举行。那是一个十分简朴的但却是人人都兴高采烈的仪式。

晚餐时分，我们大家把几张办公桌拼成一张长桌，每个人都从一楼的食堂打来自己的一份饭菜，没有加菜，也没有酒水饮料，桌上只是增放了一些糖果、烟卷、茶水。仪式开始先致词，同志们一个个向我们祝贺，欢声笑语不绝。菜肴并不精美，也没有觥筹交错，敬酒

碰杯……总之，几乎没有结婚的仪式感，更像是一次普通的聚餐而已。餐后，大家一起动手收拾桌子，自己的碗筷自己洗，也没有闹洞房之属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此简朴节俭，和当下婚礼亲朋云集，行礼如仪的场面真是霄壤之别。

我于1956年离开团市委，调北京工作。团市委何时迁离，这座如诗如梦的建筑何时移作他用，以及后来成为马勒饭店，我都没有所闻。但是不意之中，我和这个别墅又发生了一桩新的缘分。

那是2014年，我和妻子结婚60周年，听说这家饭店对外接待客人居住，我们几近本能地想到60年钻石婚的纪念要到那里去过。女儿十分支持，立即提前为我们预订了房间。9月29日，我们跨进了饭店的大门。啊！一个甲子过去了，一切都

有变。门口那间小屋是门房，进入风格独特的城堡入口前，一眼就看到花园边缘上那匹马勒的爱马的青铜雕塑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近80年过去了，世事变迁交替，它是最权威的见证者。

进入我们预订的二楼1008号房间，是一个大间，房间内老式壁炉、老式台灯、青花瓷瓶、红木古董家具，古老与现实交融，目之所及，令人愉悦。走出卧室，我们又在楼上楼下兜了一圈。我原来上班的那个东边的大办公室，现在改成了一个宴会厅。推开窗户俯瞰，那青翠的草坪，绿树沿墙围绕掩映，树梢后面露出城堡彩墙的顶端。花园面积不算大，但精致亮丽，吸引眼球。我们在饭店南平台上享用下午茶，草坪边缘镶嵌着一排秋海棠花带，正是桂花盛开季节，空气中飘来一阵阵桂花的幽香，淡淡的，沁人心脾。在这里休憩，真是心旷神怡！

吃香喝辣，这四个字，从古至今，都不能让人看着舒服，好像弥漫着一股颓废和奢靡之气。杜工部说“朱门酒肉臭”，接下来一句当然是“路有冻死骨”了。对比嘛。那么，“吃香喝辣”呢？对应的，或者“含辛茹苦”，或者“饮冰茹檠”。反正，无论怎么解释，都不像是正能量。

真是这样吗？我们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江西、湖南等地的同胞，难道不是天天在吃香的、在喝辣的？辣椒、花椒以及各种香料，是当地老百姓烹饪的基本材料。无论发达或者困顿，他们就是好这一口，经济上也承受得起。既然如此，吃香喝辣怎么就颓废和奢靡了呢？

再说江南一带的人，普遍喜欢吃甜，难道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一定是浸泡在“蜜罐”里以致幸福得乐开了花？不至于吧。

吃香喝辣，乃至挑精拣肥，是人类饮食的理想和方向之一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拒绝和批判，当然，我们也不应当对不喜欢吃香喝辣的另一部分人群给予歧视和偏见。

这本小书，是关于味道的书。细分一下，味道其实是两种东西的组合：一种是食材，一种是调料。只有食材而无调料的味道是令人不可想象的；没有食材依托而空有调料的味道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。但是，必须提一下的是这本小书却是偏重于对各种调料的解说和敷演。正像读者知道的那样，偏重，就是大比例倒向一边，对，倒向调料的一边。

我们常说，人生五味——甜酸苦辣咸，说的是人的一生要尝到各种滋味，饮食的，或者生活的。生活道路上的“五味”，实际上是对饮食上的“五味”进行观照而产生的通感。没有对饮食上的“五味”直接感受，是无法传递出对生活道路上的“五味”体验的信息。所以，厘清饮食上的“五味”，极其重要。

人们又说，开门七件事——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这里面也包含了好多味道，而且提升到了人的基本生活诉求的高度。因此，当人们热衷于渲染某某菜肴如何如何好吃或好看时，我们是否要告诉他们，制造出“色香味形养”的那些“幕后英雄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江湖？这正是本书作者的一点小小的心思，也可以说是给读者的一点小小的心意。

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，没有他们的帮助，作者怎么能“吃香”“喝辣”？当然，读者也是如此。

（此为《吃香喝辣》自序）

饭店的李经理闻讯过来，和我们坐在一起聊天。李经理对我们60年前在马勒别墅结婚，如今又特意返回这里纪念钻石婚颇感兴趣。他说，这可以称为我们饭店的一段佳话了。他赠给我们一只绘有马勒饭店外貌全景的彩色瓷盘，还附有文字介绍和精致外盒，他十分慎重地在礼盒上签了名。当晚，好像在家里一样，休息甚好，静谧、安详，不闻市声。

翌日上午，我们告别饭店时，在大门口又遇见了李经理，他衷心祝福我

## 吃香喝辣



## 大通古镇长江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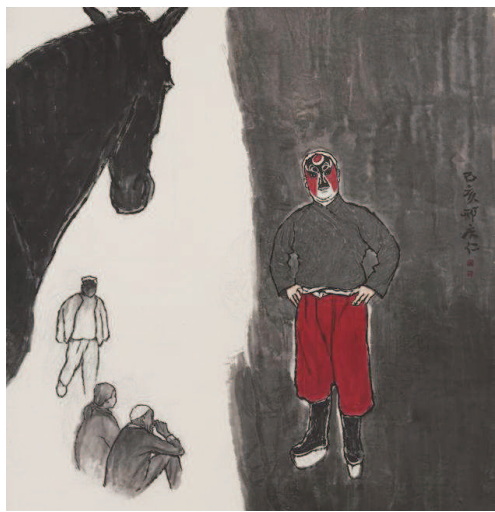
杨忠明

深秋，清晨的安徽铜陵长江边，大通古镇瀾溪老街行人稀少，和悦古渡口，晨曦里，长江，水天一色，雾气茫茫，近岸，芦荻摇曳，枫叶透红，想起杨万里之诗：“淮上云垂岸，江中浪拍天。须风那敢望，下水更劳牵。芦荻偏留缆，渔罾最碍船。何曾怨川后，鱼蟹不论钱。千年大通古镇，由瀾溪老街和江北和悦老街组成，宋开宝八年之前已经正式建镇，此地曾是“安徽四大商埠”之一，1856年曾国藩在此设立“盐务招商局”，人文底蕴深厚。

汽笛声中渡船靠岸，带来一片喧嚣声，满满一船农民挑着菜担争先恐后冲上岸来，青菜、冬瓜、刀豆等当地绿色蔬菜看得人眼花缭乱，菜叶上还沾着露水。行走在瀾溪老街，脚踩着明代厚重的四方形浅红麻石，街边两排青砖旧建筑的商舖，斑斑驳驳的木门带着历史沧桑感。瀾溪后街有口“龙泉井”井口用一整块青石凿成，井壁刻字：“嘉庆丁丑年龙泉井余以雨开”，200多年来井水清冽。

和悦老街曾有“小上海”之称，这里街面格局同上海老城差不多，曾有三街十三巷，和悦头道大街曾是最繁华的商贸大街，此地有黄家旅社、大通邮电局、一品鲜酒家、盐务招商局、裕和祥杂货店、蒋氏酱坊、大中华钟表店、李氏银楼、夏氏膏药店等。过去和悦老街还有汇丰钱庄、电报总局、报社、照相馆、板鸭店、中医院、当铺等。和悦中山路连接轮船大码头，从前路街黄包车及行人从早到晚穿行于戏院、茶楼、酒家、饭店之间，从南京、上海来进货的商人也多，给此地带来了繁荣，故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铜陵籍英雄刘四姐、赵傍根曾在大通羊山矶精彩演绎了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的原型故事。

来大通江鲜还是要尝的，宋代，此地有渔家四五百户，罾网挤满了江面，清代，鱼行七八十家之多，如今，老街上晾晒的各种鱼干散发着香气。中午，我有幸品尝到10多斤重的长江野生鲃鱼砂锅，当地人称其为“华达子”，鱼身有黏稠物，上海人叫“滑踏踏”。大厨说：“长江涨水时，大量鲃鱼涌入大通至江，当地人捕来用熟猪油作原料用砂锅慢炖出汤肉嫩的砂锅鱼，味道极为鲜美可口。”我一看，这鱼同我江西插队时，山溪里的鲃鱼长相差不多，体形更大，长江鲃鱼煮时放辣椒更鲜美，苏东坡曾赞美鲃鱼不同凡响的美味：“粉红玉首仍无骨，雪白河豚不药人。寄语天公与海伯，何妨乞与玉精灵。”大通古镇的长江段盛产鱼、虾、蟹、鳖、鳊等江鲜，国家级长江淡水豚自然保护区就设在大通和悦洲上。大院生姜也负有盛名，有“残渣遗齿，隔夜尤香”之说，早在宋代就被列为朝廷贡品。来大通，还有芙蓉鸭十八鲜、长江鲃鱼豆花鱼、红烧猪手冰姜旺烧鸭、炒米糖、米粉肉湖滩香骨等要品尝，名目繁多，只恨自己胃口小。



长安 (中国画) 邢庆仁

“7813”，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代码，它不单是我们班级的序列号，更是一段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的历史记忆，是一个新时代开启的见证。

这是“文革”后通过第一次全国统考进入大学的特殊班级，从生源和年龄结构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印记。全班61名同学，来自全国17个省市。有农民兄弟、工矿职工、下乡知青、军人、教师、应届高中毕业生。入学时最大者32岁，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，最小者只有16岁，有的是中学同校师生转而成为大学同窗。

我想给这个特殊的班集体取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改革开放的“幸运儿”，这应该是很贴切的，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恢复高考，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班集体的存在。

复旦四年，值得永久纪念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，1979年7月13日，我们班上的四位学生陈静溪、刘晓红、陶维佳、王东红（王晓望）在黄山偶遇邓小平同志，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。电影《邓小平在黄山》、电视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都记录了这一史实。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和小平同志的亲笔签名已在档案馆永久保存。这段生动故事自然应该由我班当事人自己讲述。

在此，我想追记另一件发生在我们班上

的故事。这段往事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后来的发展密切相关，可以说，正是我们班同学，成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初期的亲历者、见证人。

那是1982年4月我们即将毕业的时。被称作美国传播学“鼻祖”的威尔伯·施拉姆，在他的学生余也鲁教授陪同下访问中国，开启了“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（余也鲁言）”。十分有幸且机缘巧合的是，施拉姆的复

## 一位“幸运儿”的幸福记忆

孙瑞祥

且之行首先就来到了我们班上。施拉姆复旦之行有两场学术活动，一次是4月28日的座谈会，一次是4月29日的报告会。记得座谈会那天上午阳光明媚，施拉姆和余也鲁步入教室时向大家挥手致意，同学们鼓掌欢迎。他们二人西装革履，笑容可掬，坐在一对藤椅上。座谈会伊始，余也鲁首先讲话，他十分幽默地说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，我做不得翻译，请贵系陈韵昭女士代劳吧，随即起身鞠躬。座谈会自始至终气氛热烈亲和，互有问答。我们当时正在上摄影课，每人手里都有一架海鸥135单反相机，那天我和几位同学都给他

们拍了照片，珍藏至今。

如果说在学生时代我就对传播学有什么深刻理解，或者说对施拉姆来华意义有何洞见，那是言过其实。但对于新闻学专业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来说，能有这样一个与大师面对面的机会确实倍感荣耀。应该说，施拉姆在中国对传播学的布道，对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。我们班上著名的“三剑客”祝建华、陈怀林、赵心树就在毕业不久赴美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，他们以后的学术生涯与传播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一晃40年过去了。1982年毕业分配时，我被天津日报社和天津师范大学同时相中，就像如今的“抢人才”。天津师大负责人为了把我要到手，不惜跑到报社领导家里陈述他的充分理由：这个复旦毕业生分配到报社充其量是个好记者，但如果他当了教师，就可以培养众多好记者。如今，已经在天津师大新闻学院从教37年，从一名专业教师，到担任新闻系主任、广告学系主任、副院长、院长。所有这一切，归结为发自肺腑的一句话：感恩母校。

## 十日谈

我与复旦新闻馆 责编：徐婉青

新闻梦在心里扎了根，即使转行，也不堕其志。